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后 华北政策的酝酿 (1931~1932年)

中日两国史学界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堪称是丰硕且深入的，本章则着重于研究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华北政策的酝酿，这个至今尚被忽略的问题。首先应当说明，中、日两国史学界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下限划分标准问题，有很大分歧：日本学界基本上是将“满洲事变”的下限放在1933年5月签订《塘沽协定》^①；中国学界除个别论著^②外，基本上是放在1932年9月日本承认伪满洲国，近年来编纂的相关史料集也据此编排^③。从日本侵华史的角度，笔者认为九一八事变的下限应以1932年5月为合适。其理由有三：从日本近代政治发展来看，五一五事件的发生，宣告了政党政治的结束和军事法西斯统治的开始；从日本侵华行动来看，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日本主要为掩护建

① 但也有例外。如守岛伍郎监修《日本外交史 18·满洲事变》（鹿岛研究所出版会，东京，1973年）一书，即以“满洲建国”为下限。

② 如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1981年），亦将九一八事变的下限放在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

③ 主要有：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北京，1988年；辽宁省档案馆编《“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1991年；吉林省档案馆编《九·一八事变》，档案出版社，北京，1991年；章伯锋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十三·抗日战争第一卷·从九一八到七七》，四川大学出版社，成都，1997年。

立伪满而进行的淞沪战役结束；从日本对华政策来看，伪满洲国的建立与《日满密约》的签订（3月）以及以此为已任的犬养内阁的终结（5月），标志着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的已达，此后只有何时承认这个形式上的问题了。本书所称九一八事变，即以1932年5月为下限。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华北政策

一 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前夕，正当日本准备以“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在中国东北挑起冲突之际，天津《大公报》于7月12日发表社评《再论日本大陆政策》，文章指出：“中日外交之重大性，最近实日益增加……自东洋全局论：今日或为安危治乱之关键！”作者从“防俄御赤之道”，规劝日本政治家应与中国事实上结成非常巩固的亲善关系，扶助大陆主人自维持大陆，以实施大陆政策。两个月后的事实证明，《大公报》的“规劝”实属一厢情愿，但其立论的前提是对的，即它预见到了日本即将在华实施其大陆政策^①。实际上，九一八事变既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结果，又是其重要开端，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重大事件。

九一八事变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结果，就因为它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满蒙”政策的必然结果。中、日学者对此

^① 《大公报》1931年7月12日社评及7月11日社评《紧急善后与根本考虑》，均指出万宝山事件“适起于日本此项大陆政策发轫之时”，并希望日本朝野从大陆政策上作“根本考虑”

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①，毋庸赘述。但对于九一八事变在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发展史上的“启后”意义，则论述不足。

“所谓日本大陆政策，只是日本国力向亚洲大陆发展的一个变名”^②，泛指近代日本对亚洲大陆进行侵略扩张的思想与行动。它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形式与其军国主义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关于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形成时期的划分，中、日两国史学界均有较大分歧^③，但一般而言，是1890年12月6日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施政方针》中关于“主权线”与“利益线”的演说^④。从最初形成的方针来看，日本侵占朝鲜后，将继续向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大陆扩张，乃是其大陆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后的问题，只是如何选择时机和计划步骤付诸实施。20世纪前半期日本侵华的一个又一个高潮，就是在这一政策背景下演成的。

- ① 关于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及其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参考陈丰祥著《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金禾出版社，台北，1992年），易显石著《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东北》（日文版，六兴出版，东京，1989年）；〔日〕北冈伸一著《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日〕古川万太郎著《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东京书籍，1991年）；〔日〕小林道彦著《日本的大陆政策》，南窗社，1996年。
- ② 梁敬鐸：《日本大陆政策的成长与变质》，载梁著《日本侵略华北史述》，第137页，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84年。
- ③ 参见米庆余《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起源及其形成期特征》，中国日本史学会编《日本史论文集》，第218~21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易显石，前引书，第19~22页；〔日〕古川万太郎，前引书，第4~5页；〔日〕千叶功《评小林道彦 日本的大陆政策》，《史学杂志》第106编第8号，1997年。
- ④ 山县在该演说中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护主权线，二曰保卫利益线。所谓主权线，国疆是也；所谓利益线，乃同我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攸关之区域是也。……方今于列国之间，欲维持国家之独立，独守主权线已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见〔日〕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03页，原书房，东京，1976年。

20 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对于日本为向亚洲大陆扩张势力而急欲挤入帝国主义列强行列的动向，是一个划时代阶段”^①。日俄战争的胜利及与英、美、法、俄等国一系列协定的签订，为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大陆的扩张大开方便之门。由于朝鲜已被变为日本的“保护国”（1910 年 8 月正式吞并），因此向中国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扩张，遂成为其大陆政策的下一步骤。1907 年 4 月，明治天皇正式批准了军部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国防所需兵力》及《帝国军队用兵纲领》^②，表明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在 20 世纪初年即已拟定了为实现大陆政策，不惜发动世界战争的战略计划。

1911 年 10 月，中国发生辛亥革命，动荡的局势为日本实施大陆政策提供了良机。尽管日本政府和军部在如何贯彻该政策上有些分歧^③，但 10 月 24 日西园寺内阁决定的一项对华政策显示：日本企图在“满洲”暂与俄国协调，待机进行“根本解决”；“今后应特别致力于在中国内地扶植势力，并设法使列国承认我国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④。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在华的种种表演^⑤，均表明日本统治集团实施对华政策的基本倾向是分裂中

① [日] 今井清一著《日本近现代史》第二卷，中译本，第 3 页，商务印书馆，1983 年。

② 关于该文件的制定过程及内容，参见 [日]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战史丛书·陆军军备战》第 59~61 页，朝云新闻社，1979 年；《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 149~153、158~162 页，朝云新闻社，东京，1967 年。

③ [日]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中译本，第 367~370 页，商务印书馆，1980 年。

④ [日] 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文书》，第 356~357 页，原书房，东京，1978 年。

⑤ 王芸生：《日本对辛亥革命之操纵与干预》，《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三十一期，1933 年 8 月。

国，亦即以策动“满蒙独立”为首要步骤，继而以培植各种亲日势力的独立为手段，分裂全中国。自民初以来直至九一八事变的 20 年间，日本对华政策基本上沿续了这个倾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日本的“天佑良机”，日本即以“二十一条”暴露了其从“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到“根本解决中国问题”、进而称霸远东的野心。但战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使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受到英美的遏制。因此，在 20 年代，日本对华政策基本上贯彻了“币原外交”的协调路线。但与此同时，军部则继续修订《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并正式厘定了“对华作战计划”。1923 年 2 月，大正天皇正式批准了军部第二次修正的《帝国国防方针及所需兵力》、《帝国军队用兵纲领》^①。这是日本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远东形势而制定的对外军事战略。与 1918 年 6 月的第一次修正相比，此次强调以美国为目标重点设防，并以美、俄、中为序制定作战计划，中国已成为与俄国并列的第二假想敌国；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用兵纲领》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中国的作战方针是以攻占华北为“主作战”，以占领华中、华南为“次作战”。根据这一方针，并鉴于中国国民革命高潮将至的情况，日本军部在制定《1926 年度作战计划》（即对中、俄、美三国作战计划）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对华作战计划”，其中对于京津、山东方面的华北地区，准备使用 7 个师团，占对华作战总兵力（16 个师团）的近 50%，约占对三国作战总兵力（32 个师团）的 22%；而且规定 1926 年度的对三国作战计划一直沿用到 1931 年 8 月为止^②。这就是 20 年代在“币原外交”的同时，日本最高统帅部针对远东国际情势和中国政情而策定的对华军事计划。由上述这些在二战前一直被密藏

^① 《战史丛书·陆军军备战》，第 93~95 页。

^② 参见《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 301~302 页。

武库（只有内阁总理大臣可以过目）、且战后多被烧毁的最高统帅部文件^①，可以看出，20年代前半期，日本已经确定了继“满洲”之后，以华北为重点的对华作战方针和计划，华北成为日本侵略东北之后全面侵华的过渡桥梁，这就使大陆政策的实施步骤在军事上进一步具体化。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登台，宣告了“币原外交”的破产。“田中外交”的对华“积极政策”，表现于“东方会议”上决定的《对华政策纲领》。该政策的核心是确定了将“满蒙”与“中国本土”分离的方针，同时也确定了对中国实施武力干涉的方针及对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对策^②。在日本大陆政策发展史上，东方会议的召开及其对华政策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表明分离满蒙，进而分离全中国的大陆政策将付诸实施。此后不久出笼的所谓《田中奏折》，更将日本“先征服满蒙、进而征服中国及世界”的政策暴露于世^③。田中内阁垮台不久即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于30年代初波及日本并于1931年达到高峰。由于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使日本国内外矛盾更加激化，法西斯势力乘机崛起。在这种形势下，伴随着“满蒙危机”的叫嚷，首先发动九一八事变以解决满蒙问题，进而经由华北征服中国与世界，遂成为30年代日本实现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这一点，就连当时中国的舆论界也认识清楚。《申报》在九一八事变不久即发表“时评”，以“血泪之言”正告国人：“日人此次暴行，实

① 此情况可参见《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158~159页及《战史丛书·大本营海军部·联合舰队（1）》（朝云新闻社，1975年），第262~263页。

② 〔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文书》第101~102页，原书房，东京，1978年。以下简称《主要文书》（下）。

③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学术界有争议。参见沈予《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笔者则从“田中奏折”的内容上“宁信其有”。

为我国家之生死关头。东北半壁山河，今已沦入日人铁骑蹂躏之下。国人慎勿误认日人之暴行，纯为对美国与苏俄挑战，而忘自身处境之危迫。实则日人所争者，我东北也。所蹂躏者，我东北也，铁蹄到处，山河易色，其大陆政策实现之日，即我国家、我民族灭亡之时。^①

综上所述，在日本大陆政策发展史上，九一八事变既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所谓满蒙问题根本解决；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表明日本在征服“满洲”之后，将经由华北进而征服中国。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日本对华政策，就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下去的。

二 华北谋略的出台与天津事变

由于华北与东北地区在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密切关系，日本在策划九一八事变之初，对于华北就十分重视。例如，1931年8月出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此前（1926年）在驻华公使馆任武官时，曾在《对华作战如何爆发之研究》一文中，围绕战争爆发的“经济原因”，论述了满蒙及华北与日本生存的密不可分关系，指出：在日本失去太平洋制海权的最恶劣情况下，满蒙及华北的物资对于日本国防具有重要价值。他说：“满蒙及华北一带的物资，是帝国国防上惟一的粮源，开发该地区并提高其经济价值，可在平战两时满足我方需要。……此乃保障日本及日本人得以永远生存的重要而惟一之方策，也是决定帝国存亡的重大关键。”^② 他的这一思想，为参与策划

① 《日军突然占据沈阳》，1931年9月20日《申报》第一版第三张。

② 全文原载（日本陆海军档案）（缩微胶卷），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北京图书馆（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Reel 104（胶卷号，下同），T645（文件号，下同），第12552~12582页。

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所继承。板垣于 1931 年 3 月在《由军事上所见的满蒙》的演讲中也谈到：假定太平洋上发生波涛惊险、与美国发生战争之时，日本继续进行战争所需的物资“基本可以满蒙及华北所有的物资来补充而决无担忧之必要”^①。板垣的这份讲演稿，当时曾被日方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布，从而在九一八事变前，使华北对日本国防的战略价值更加突出。尽管如此，日本此时由于集中以武力根本解决满蒙，对于华北则力不从心，故只能配合这个中心，相机在华北策划反对张学良的谋略活动。

自民初以来，华北可谓中国的多事之地，而尤以北平（政治中心）、天津（经济中心）两市及山东省（日本仅次于“满洲”的特殊权益之地）最为突出。这里既有北洋军阀的余孽，又有新军阀之雄辈，各派政治势力猬集且与日本极具联系，为日本提供了在此施展政治谋略以分裂中国的余地。还在 1930 年的中原大战期间，日本曾企图插手支持以阎锡山为首的北方势力进行反蒋^②。大战后，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但与日本有宿怨的张学良入主华北并遥制东北，自然成为日本推行满蒙政策乃至华北政策的“眼中钉”。于是从 1931 年初开始，日本即利用华北各地方军阀对张学良的“反感”，策划了以“反张学良运动”为名的政治谋略活动，作为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必要准备和染指华北的重要手段。

1931 年 3 月，参谋本部派遣土肥原贤二到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土肥原即和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密谋：借张学良卧病，在华北进行反张运动。当时“他们在华北的反张运动中两颗主

^① 《现代史资料 7·满洲事变》，第 143 页。

^② 关于日本与中原大战的关系，限于篇幅，本书不再详述。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S49, SI615-7；《对蒋介石反感、骚扰关系，北方政府组织关系，帝国之态度》（1930 年 4~11 月），第 1~79 页。应当指出，此处所收外务省文书相当零散，估计大部已被毁坏了。

要棋子：一是 1930 年底蛰居大连的阎锡山，另一个是现在河南的石友三^①。此时，反复无常但倾向反蒋的石友三还受到广东方面的支持，被任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通过东北的张学成“与日方切取联系”^②。而自中原大战失败后隐居大连的阎锡山，这时也与日方商定，并派人与石、韩联络，密定由石友三沿平汉线北攻张学良，韩复榘出山东，晋军及宋哲元部亦出兵策应，日本则进军东北抄张后路，并拟制了军事活动地图^③。

在关东军怂恿和帮助下，阎锡山于 6 月 15 日乘日本飞机秘密返回山西^④。7 月 18 日石友三通电讨张，20 日于顺德誓师后沿平汉路北进。但由于韩复榘自顾不暇和阎锡山返晋后食言，石友三部在蒋、张两军南北夹攻下，不出半月即溃败。策划这一行动的土肥原亦于 8 月 18 日调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此次石友三反张运动虽然失败，但由于东北军主力在中原大战后再次入关，客观上便利了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⑤，并

① [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土肥原秘录》，中译本，第 111 页，中华书局，北京，1980 年；[日]司马桑敦著《张学良评传》，中译本，第 139 页，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 年。

② 6 月间，石与张的密电曾为张学良行营截译。参见于学忠《东北军讨伐石友三战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6 辑，第 119~120 页，中华书局，1960 年。

③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 151~152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4 年。

④ 《土肥原秘录》第 112 页。阎锡山生前对此事守口如瓶，参见中共中央党校《阎锡山评传》编写组《阎锡山评传》，第 211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 年。

⑤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在关内兵力达 11.5 万多人，约占其东北边防军总兵力（26.8 万）的 40% 强。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实际上就考虑到了张学良方面驻满兵力减半这一事实后进行策划的。参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之路》第二卷《满洲事变》第 85 页及注①，朝日新闻社，东京，1962 年。

使土肥原“利用石友三之乱消灭张学良的势力，以便与华北同时一举解决满洲问题”的企图^①基本实现。这次发生于九一八前夕的短暂的“石友三工作”，奠定了日本此后染指华北的方式。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在实施“北满谋略”、策反马占山的同时，再次派遣土肥原返任天津特务机关长，策划了两次天津事变。学界以往关于天津事变的研究很少，且一般视其为土肥原挟持溥仪逃离之举。其实这只是次要方面。天津事变的主旨乃是日本对华北的谋略。事变前，日本陆军中央部根据1931年秋末的形势判断，拟定过一份“对华政策细目”，其中规定对中国本土的政策是，摧毁张学良及国民党现政权，使中国陷入一时混乱，并使世界视听远离满蒙；如有可能，在华建立多个政权，从华南到华北均使日本色彩浓厚起来；还规定对华北“采取操纵华北军阀的谋略，以摧毁张学良政权”；对华中的策略是“要求南京政府取消排日、排日货，如其不付诸实施，帝国则采取有效适当的手段”^②。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制定的第一份全面而详细的对华政策文件，其中对中国本土的政策，特别是对华北的策略，成为日本实施“华北谋略”、发动天津事变的指导方针。

自石友三之乱失败后，华北的反张学良运动一时归于沉寂，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反张学良运动又开始暗中抬头^③。关东军对于寓居天津的溥仪早有打算，曾在9月27日要求天津军（即天津的“中国驻屯军”——笔者）监视溥仪，并考虑

① “土肥原谈话录”（1943年12月27日）。这是土肥原留下的惟一回忆录，可见此为其得意之作。《土肥原秘录》，第109页。

② 《现代史资料7》，第165～171页。

③ 〔日〕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中译本，第一卷，第123页，中华书局，1981年。

将来由海军的遣外舰队将溥仪携往东北；但由于海军方面拒绝，关东军只好仍依赖天津军^①。10月8日关东军开始轰炸锦州（九一八后张学良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后，10日即着手研究准备援助中国驻屯军，助长反张运动，颠覆锦州政权，并将土肥原以下若干人派遭到天津军的方案^②。14日，参谋本部亦指示关东军：既然难以得到海军的支持，山海关方面只好交由天津军自我处理，关东军对此应进行支持的准备^③。这时，在九一八后不甘寂寞且资格较关东军更老的天津军，也对于锦州政权和华北的张学良势力，表示了更大的关心。10月中旬，天津军司令官香椎浩平致电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使满蒙问题的解决更加容易，不仅要在满蒙消灭原有的旧东北军阀，而且要尽快摧毁张学良在河北的势力。”这表明了该军对谋略活动的积极意图^④。20日关东军根据形势和军部的指示，确定“当前最紧急的任务是摧毁张学良在华北的政权，为此应在华北设立最有力的机关，统制目下正酝酿之中的各种反张运动并加以促进”，并决定起用土肥原^⑤。土肥原奉命后于25日携带相当数量的“谋略费”，潜往天津，再设特务机关，他的秘密使命是除了利用山东的韩复榘，通过各种谋略活动，扰乱平津地区，破坏张学良政权之外，还要利用间隙，设法策动隐居于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出走满洲^⑥。可见，关东军当时派土肥原策划天津事变的企图，主要是为了反张学良并摧毁其在锦州设立的东北政权。关于这

① 《现代史资料 7》，第 194~195、197、199~200 页。

② 《土肥原秘录》第 114 页；《现代史资料 7》，第 208 页。

③ 《现代史资料 7》，第 211 页。

④ 《太平洋战争之路》第二卷，第 89 页。

⑤ 《现代史资料 7》，第 223 页。

⑥ 《土肥原秘录》，第 114 页。

一点，11月3日，板垣征四郎经关东军司令官及参谋长同意后，曾向参谋本部次长、陆军省次官报告如下：“眼下酿成华北的反张学良运动，乃是可喜现象……我方最希望的是，随着张学良政权的崩溃，华北产生亲日新政权，且成为与南方之间的缓冲地带；进而还可以依靠这一势力，将南方尽收麾下。”^①这是天津事变前夕，关东军真正意图的暴露。

日本在天津共策划了两次事变。第一次事变发生于11月8~20日，其间，土肥原挟持溥仪出津的阴谋得以实现，但其操纵下的以李际春为首的“谋略部队”即天津便衣队的暴乱，受到中国部队的打击而失败。该便衣队曾打着“河北省救国人民自治会”的名义，进行反蒋反张运动，其目的是“打倒压迫河北人民，现在又挑起满洲事变的张学良政权，把河北省变成以河北人实行自治的政治团体为主的省份”^②。这一政治目的正符合日本的华北谋略。第二次事变发生于11月26~27日。此前，受关东军板垣参谋所派的川岛芳子，女扮男装潜入天津，准备将溥仪夫人婉容带到东北。婉容26日夜秘密逃出后，与川岛芳子一起，于27日乘船赴大连^③，从而完成了劫持溥仪的第二步行动。天津军其间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以掩护川岛的活动。在溥仪离津问题上，日本外务省开始不同意，外相币原曾命天津总领事田尻（代理），“对宣统帝的动静应严加监视，极力阻止其逃出我租界之外”^④，但在与军部协商后态度则改为：“如果对于国策的执行没

① 《现代史资料 7》，第 243 页。

② 〔日〕支那驻屯军司令部：《天津事件概况》（1931.12.5），《日本陆海军档案》，Reel 109, T818，第 19405 页。

③ 见北平参事官矢野致币原外相电（11月26日）、天津总领事桑岛致币原外相电（11月27日），《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一卷第二册，第 89 页。

④ 币原致田尻电（10月1日），《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一卷第二册，第 1 页

有妨碍，听其自然亦无不可。”^① 这证明天津事变前，关于溥仪问题，日本外务与军部两方已达成默契。

此外，关于“天津事变”，日本当时对外曾极力否认其所为。天津军司令部关于此事件的报告中^②，也将天津事件诬为中国方面的“不信行为”、“非法暴戾的挑战”；日本参谋本部所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一书中的《华北方面概况》对此亦避而不书。其实，还在事变当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就把土肥原等在津策划第一次事变及天津军发动第二次事变的真相，向币原外相作过“对外绝秘”的报告。为澄清和保留史实，现摘录如下：

11月17日电报第553号：“土肥原来津的目的，是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意思，为实现满洲独立，迅速把宣统帝劫走，并摧毁张学良的势力。……根据对其同伙的内查而得到的确证是：（土肥原）来津后，首先试图与安福派联系，但他们不响应，结果只好说服与当地保安队有联系的张壁及与无赖汉、青帮等深具联系的李际春，以及在于学忠部下之间有威信的张廷福等人。为了收买保安队、组织便衣队及使于学忠部队入伙，花了5万元的运动费。还策动驻屯军中二三人，把关东军运来的武器偷偷补充李际春部，并让他们参加一切暴动计划。……当时内情是：已经约定于8日夜10时暴动，悄悄行事。但由于公安局方面根据张学铭的情报加强了8日的戒严，保安队又未按期呼应，只好由李际春纠集的便衣队行动，暴动乃归于完全失败。……暴动变成日中间的冲突，则是土肥原又投下一石，不仅煽惑我侨民，且扰乱

^① 币原外相致天津总领事桑岛电内转小矶致板垣电第84号（11月6日），同上书，第29页。作者注：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9年）第290~291页，所引日本外务省档案之电报有误。

^② 《日本陆海军档案》，Reel109，T818，第19405~19413页。

天津治安，颇有损于帝国的威望与国际立场。特别是，他所操纵的反动分子按他的命令而明目张胆地行动，更让人难以想像。内外各种疑惑纷纷，我认为也不无道理。我虽然曾向其同伙恳求不要再行此暴举，但他们继续实行倒张计划，难免近期京津地区不再发生此等事变。……由于中国方面担心土肥原来津后对其同伙的策动关系，我相信此次暴动一定与他有密切关系，对其同伙今后的行动应更加注意。”

12月5日电报第664号：“（第二次天津事件）好象是突发的……实际情况是：（中国驻屯军）目的是扩大事态，以作为增兵口实。一部分部队出于这一目的，向中国方面正规军挑战，并与之交战，作为一举摧毁张学良的开端。为此，驻屯军还不断向义勇队宣传这样的方针：我军近期已开始积极攻击，占领中国街，排除排日运动的祸根。义勇队员就信以为真，进行乱射乱击，并伤害了普通人。……总之，8日暴动以来，对于土肥原及天津军的不满逐渐抬头，就连26日已付给5千银元的义勇队如今也怨气冲天……。驻屯军今后的行动也不能不令人担忧。为此，应在适当时机，说服军部中央在大局上面共同保持自重。”^②

天津事变基本达到了转移国际视听、配合关东军进攻锦州的目的。但天津军并不甘心充当“配角”，强烈希望参与行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增强兵力，并与关东军遥相呼应，在山海关歼灭锦州的中国军队。它认为，“若消灭锦州军队，其影响所及不仅会使张学良一蹶不振，而且关内□□军（应指中国军——笔者）也可能分崩离析，这时就很可能容易找到华北作战的借口”^③。

① 《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一卷第二册，第80~81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一卷第二册，第134~135页。

③ 《太平洋战争之路》第二卷，第104~105页。

也就是希望将事态扩大到天津地区。由于天津军的意图受到关东军的反对和参谋本部的压制，日军才没有在平津地区大动干戈。但尽管如此，1932年1月3日关东军不流血地占领锦州，意味着直至山海关在内的长城一线，事实上已置于关东军的统治之下。同日，天津军司令官向山海关守备队长发出指示：“为了不使关外事态直接波及关内，山海关（含）以西，由中国驻屯军负责处理；山海关以东，关东军负责处理。……中国驻屯军不向关外派兵直接协助关东军进行扫荡……但对于危害中国驻屯军守备队及关内侨民的中国军队，可运用自卫权。”^①1月5日，天津军与关东军的联系确立，两军以万里长城为界，至此已完全握手言和^②。这些都隐埋了一年天津军挑起山海关事件及关东军入关作战的伏笔。

三 伪满“建国”与华北

1932年初日军攻占锦州，哈尔滨亦指日可得。因溥仪已到手且有上海事变的硝烟掩护^③，九一八事变进入第二阶段，即建立伪满洲国阶段。这期间的伪满“建国”与华北有很大关系，因为日本在炮制伪满之时，已经将与之毗连的华北列入其政策范围，故应一并述及。

早在1930年9月，在石原莞尔主持下，关东军完成了一份《关于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的方案，提出分三个时期实施

^① 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第132~133页。

^② 《现代史资料7》，第334页。

^③ 一二八上海事变理应作为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内容，本书略述。关于其与日本炮制伪满洲国的关系，参见事变策划人田中隆吉的谈话，载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49~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75年。

对占领区的统治^①。是年底，参谋本部也开始酝酿并于 1931 年 4 月最终作出《1931 年度形势判断》，提出分三个阶段“根本解决满蒙问题”^②。第二次若槻内阁成立后，新任陆相南次郎同意设立以解决满蒙问题为名的由陆军省、参谋本部的“中枢课长级”组成的“国策研究会议”^③。6 月 19 日，由该会议研究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随后军部向回东京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传达了这个方案^④。这是由陆军中央部统一决定的发动九一八事变、解决满蒙问题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9 月 19~22 日关东军对军部的上述方案反复进行讨论，并由参谋本部建川美次参加，最后确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提出“建立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的方针，并拟起用热河地方的汤玉麟等人为镇守使，负责维持地方的治安^⑤。10 月 21 日关东军拟定了《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作为“满洲建国的第一次具体方案”，其领土范围除东北四省外，又增加了“东省特别区”与“蒙古自治领”两部分^⑥。24 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决定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针》，提出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与中国本土分离、表面由中国人统治而实权掌握在我方手里的、以东北四省及内蒙古为领土的独立的新满蒙国家”^⑦。此后，关东军加快了建立伪满的步伐。12 月 11 日若槻内阁总辞职，关

① [日]稻叶正夫等编《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第 91~95 页，朝日新闻社，东京，1963 年。

② 《现代史资料 7》，第 161 页。

③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 306 页。

④ 《现代史资料 7》，第 164 页。

⑤ 《现代史资料 7》，第 189 页。

⑥ 《现代史资料 7》，第 227~229 页。

⑦ 《现代史资料 7》，第 232~233 页。

东军认为“这将在解决满蒙问题上出现转机”^①。15日，经参谋本部批准，关东军决定设立“统治部”，取文治主义，以统辖伪满建立工作^②。12月23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共同制定了《处理时局纲要案》（第一案），提出处理时局的根本方针是“在帝国军队威力之下，使满蒙在本质上形成帝国的保护国状态，并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运输等各种关系上，体现作为帝国永远存立的重要要素的性能”，并进而提出，“对中国本部政权，进一步提出取消排日排货的最后要求，不能实行时，应采取必要有效的措施。中国本土发生骚乱之际，对于重要方面，需要进行对侨民的现地保护时，应断然出兵”，“对于中国本部，则支援反张反蒋势力特别是北方实力派（如段祺瑞），以期消灭排日祸根之所在——国民党”^③。这是到1931年底，陆军中央部根据关东军的方案确定的处理时局方案，它表明除建立伪满之外，日本将干预中国本部政权（即国民党政权），且将支持反张反蒋势力特别是华北实力派，因而这一文件可视为九一八以来军部对华政策的总结。如此，日本的所谓“解决”满蒙问题，已演变为建立伪满洲国，而且在酝酿阶段，自始即把本属于华北范围的热河省和内蒙古作为其“辖区”。

1932年初，日本进入“处理”满蒙问题的阶段，即建立伪满的阶段，这也是刚上台的犬养毅内阁的首要任务。1月4日，关东军决定了建立伪满的最后方案，并派板垣将此案携回东京^④。这期间，1月6日犬养内阁的陆军省、海军省与外务省，根据去年底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商定的上述“处理时局方案”，决

① 《现代史资料 7》，第 299 页。

② 《现代史资料 7》，第 302～303 页。

③ 《现代史资料 7》，第 320～321 页。

④ 《现代史资料 7》，第 332～335 页。